

◀ (上接9版)

以经常是挂个名,把实际的工作分给下面的学生或者年轻教师。我这个人比较耿直,要么不答应,答应了就要担负起主编的职责,做到问心无愧。辞典编撰非常考验主编的学识和耐心,每个词条都要字斟句酌,来不得半点马虎。退休以后,外面一直有人找我,不是一堆课题就是各种规划,事情也比较多,但我的重心仍放在《辞海》的修订上。一来中央和上海都很重视;二来中国是文化大国,但我明显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国情的学习不是那么热情,甚至出现了一种文化缺失,而《辞海》里面的内容可以当做基本的精神食粮,重新构建和完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。

在做《大辞海》和《辞海》(2019年版)的时候,我以褚绍唐教授主编的“1989年版”为底本,结合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地理学科的发展来安排修订。20年来,中国地理早已不是当时的样子,自然地理状态并未一成不变,而历史地理又有大量新的发现,因此有必要做一次系统的升级和全面的梳理。与《辞海》将学科词条打乱后再编排的方式不同,《大辞海》严格依照学科划分,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鲜明的专业属性。单单是中国地理卷的词条结构,我就起草了好几版的意见稿,在不打破辞书原有特点的基础上,纵向挖掘、横向延伸,努力推进地理学科化。所谓“不打破”,就是充分利用老版《辞海》的词条,理顺体系,基本内容要保留,不足之处要充实,但是新增的部分不宜太多,不过于追求动态的统计数据。我把辞书社的编辑们请到家里来开会,美其名曰吃饭,大家就词条结构的总体思想和基本原则达成了一些共识。我们做的是一本强调学科分类的工具书,并非简单的地名词典,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地理辞海”。在编纂过程中,要处理好点、线、面的关系。笼统地说,点是地名,线是线路,面是区域。

到了审读阶段,为确保词条和释文的准确性,我专门买了一套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作为参考,工作时常常堆满一整张桌子。中国地理部分有几千个条目,每一个都去查阅原始数据,估计好多年也弄不完,没办法,只能选择抽查。假如校样的数据与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有出入,我就会要求编辑提供资料来源,反复核查。那两个月时间,其他事情我都无暇顾及,就是一门心思地审阅条目。有时我也在想,是不是所有的分卷主编都会这么投入。就《大辞

海》的中国地理部分而言,相较《辞海》的编纂有了较大的变革,辞书社和读者应该都会认可。唯一的遗憾是,中国地理与历史地理放在一起出版,冠名“中国地理”,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,至少应该在封面上进行标注说明。可能是有总卷数的限制,而辞书社当初做方案时没考虑到这种情况,相信今后会有改进,各自独立出版。

无论《辞海》还是《大辞海》,能否取得满意的成果,离不开这几个要素:一是参与者充分认识到编纂和出版这本工具书的重要意义,只有你认识到这一点,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才愿意付出;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,不能把辞书编纂当成是工作负担,而是个人研究志趣的一种提炼和实践;三是分科主编的学术能力必须过硬,对负责的学科领域完全吃透,如果这里不懂,那里不会,就不适合做主编;四是出版社编辑的水平要高,除了文字感觉好,他们对于专业知识也能游刃有余地鉴别、判断,并且充分尊重分科主编的意见。这一次,我找了辞书社的老编辑薛国屏来做搭档,他与《辞海》打了许多年交道,经验丰富,行政区划这一块内容也很熟悉。

前几天,我把10万字的自然地理部分审完了,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了辞书社的编辑,比如有的词条将山的平均高度和绝对高度混淆了。《辞海》面对的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读者,每条释文的写作都讲求准确和严谨。我在审读时会特别留意关键性的内容是否缺失、本质性的表述是否清楚。如果能在100个词条中找到一处疏漏,就算是做贡献了。我还建议《辞海》的地理部分要关注重点和热点,像大的经济区、城市群、城市群,紧跟国家的政策趋势;至于沿边、沿海和边疆这样的词条,更不能出一丁点差错。近段时间,南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,原来的释文太过简单,我就自己去查最新的政治表述,将不可缺少的几句话补充进去,强调曾母暗沙到中国大陆的距离大约是2000公里,这就界定了南海是中国最远的领土。

在我读大学时,中国地理、外国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学科组成,李春芬教授讲美国,胡焕庸教授讲法国,程璐教授讲中国,既有自然地理也有经济地理,这才让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地理观。可惜的是,今日学界很少有人具备比较全面的地理知识,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地理教育的不平衡。现在的高等院校往往热衷于遥感、地图、计量,但是中国地理呢?另一方面,受到高考指挥棒的左右,年



陈尚君,负责《辞海》(2019年版)唐代文学部分的修订。

轻学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这种知识,水平一直停留在初高中阶段。中国地大物博,我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地理,又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?我认为这样的工具书应该继续出版下去,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。问题是,我今年80岁了,不知道下一版《辞海》的修订还能不能参加?如果我退了,后面谁来接替我的工作?

《辞海》最重要的部分,实际上是高度凝练了各方面的知识,用最简明、最准确的语言向读者传达与之相关的信息

陈尚君(复旦大学教授):《辞海》的古代文学部分一直是复旦这边在做。我最早开始参与的是“1989年版”,大约有3000个词条,我与骆玉明老师、章培恒老师三人分工明确,分别负责唐宋、唐以前、元明清。我们以《辞海》(1979年版)为底本,全力以赴做了半年。把每一个词条的每一句话所涉及到的详尽文献都梳理了一遍,把每个要点最基本的研究、发展变化和所取得的成果都进行了及时更新。“2009年版”,和我一同参与的还有汪涌豪和黄仁生;“2019年版”,我做唐代部分,宋代的内容交给朱刚。

在做“1989年版”的过程中,我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,文字改动之大是超乎想象的。再往后的几个版本,主要是评价的变化、补充新的史料,以及一些尺度的重新把握。诗词能揭露社会矛盾、反映民生疾苦,但反复地说这些,就没什么意思。《辞海》释文的篇幅有限,一个人的诗好不好,最好用几句话

就能讲清楚,抓住要点,这就需要仔细斟酌。《辞海》最重要的部分,实际上是高度凝练了各方面的知识,用最简明、最准确的语言向读者传达与之相关的信息。在我负责的这部分工作,我做到了这一点。可以非常自信地说,《辞海》(1989年版)的唐宋文学部分达到了一个巅峰。

为了做好“1989年版”的修订工作,辞书社把以往出版的《辞海》拿给我们作参考,包括“未定稿”。在读“1936年版”的时候,我感觉老派的味道比较重,出自诗画的文献来源比较多。比如“念家山破”,诗画里提到了一句,考虑到没有使用价值,就删掉了。“1936年版”还有一个特点,文字比较旧派,行文古雅,但是科学性、详尽的事实考证会弱一点。后面的几个版本,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前后,虽然都是名家在做,但改动的内容很有限。

《辞海》修订牵涉的问题太过复杂,没办法带学生一起做。如果让我去跟学生解释清楚,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是我单干的好几倍。过去10年,唐宋文学部分至少有3位一流作家(韦应物、李益、姚合)的墓志出土了。韦应物写过《滁州西涧》——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,他是唐代学陶渊明学得最好的诗人,过去的生平叙述不够完整,现在就能将墓志上记载的准确内容(生卒年份、字号、个人经历)补充进来。在做“2019年版”时,我主要关注学界的最新变化。比如某个人的文集有了新的注本,有必要加以介绍,此外就是完善一些观点的表述。

我们应当知道,古代文学部分有很多问题是极其复杂的。比方说,人们经常提到的花蕊夫人,说她是五代时四川的一位女诗人。但是关于花蕊夫人这个人,有不同的传说,出现

了前蜀、后蜀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。近代以来最有名的一篇文章,即浦江清的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,他在文章里非常明确地表示,花蕊夫人应该是前蜀皇帝王建的妃子。理由是在她的诗中,从景物到节日,就连涉及的制度都是前蜀的。所谓后蜀之说,仅仅是一个传闻。这个词条通过《辞海》表达出来,最后只有100多字,在这么小的篇幅内要说清楚哪些是、哪些不是,这就需要修订者具有精准的眼光。也有一些词条的字数会比较多,像李白、杜甫这样的。

再比如,有一本宋代的诗话叫《全唐诗话》。这部书牵涉两个问题,一是它的作者,二是它的价值。早年的《辞海》称这部书“内容简明完整,对于研读唐诗很重要”,但是我在“1989年版”上把这个词条的表述改成了“完全抄《唐诗纪事》的,是一部伪书”。关于这部书的作者,有4种说法,需要一一说明,每种说法只能用一句话。通过这么一项工作,我自己得到了很好的学术锻炼。《辞海》的工作做得多了,个人的文风也会受到影响,尽量避免啰嗦,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表达最复杂的问题。

在修订词条时,轻重的拿捏、真伪的分寸,往往考验着作者的功底。《二十四诗品》以前是作为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,但我经过详尽考证,发现这其实是一部伪书,那么在《辞海》中应该怎样表述呢?个人的意见,在没有百分之百给出定论的时候,学界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。怎么办?说起来复杂,解决很简单。在“唐司空图著”的前面加一个“题”字,即“题唐司空图著”。这就表明,《二十四诗品》在存世的版本中,题的名字是“司空图著”,至于作者不是他,那就不管了。

我觉得,《辞海》总体来讲还是健康的,为读者提供了有用的知识,并且质量够硬,口碑也很好。现阶段出版《辞海》,维护品牌是一个方面,同时也要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变化,要有变通的途径。1980年代,一个家庭有一册《辞海》在手,相当于拥有一本浓缩精华的百科全书。进入网络时代,传统的观念要跟着转变。就数量和广度而言,网络上汇集的知识远远超出了一本辞书所能涵盖的范围。一旦受制于纸张篇幅,客观知识的表述就是有限的、不全面的。另一方面,知识日新月异,所以我在想,辞书社是否可以在《辞海》之外推出《当代辞海》,对当下社会需要的“活的知识”进行整理和表达,以弥补《辞海》修订周期过长而造成的信息滞后。